

伊格尔斯: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

导语:

伊格尔斯:《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选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九章,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35页。

本文介绍了年鉴学派第二代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日常生活史、法国心态史、意大利微观史学等多种探究日常生活的历史性社会研究,特别关注了如何认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联、如何认识“日常生活”、如何认识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之间的差异等论题。

我国台湾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参考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刊于《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59页。参考邢义田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按专题分为十三种,其中尤以《生命与医疗》、《生活与文化》、《妇女与社会》等值得参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新史学》两份杂志也有大量相关论文。

(李康)

原文: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仅是西方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也有东欧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质疑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前提了。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世界观,其关键在于相信现代化乃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信仰的最激进的形态是在弗兰西斯·福山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中提了出来的,它宣称现代技术性的社会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而伴之以代议体制,就标志着作为历史发展产生的事物合理秩序的成就。其他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家们,像是于尔根·柯斯卡,则远没有那么信心十足,他们察觉到了现代社会的破坏性方面,然而却表现出对现代化的整体的积极性质的信心,在其中市场经济与一种高度发展的技术就会伴之以民主的政治体制而保证公民的自由、社会的正义和文化的多元主义。在柯斯卡看来,纳粹主义以及东欧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的崩溃,就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的看法是,批判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关键功能就是要指出妨碍

了真正现代社会的20世纪社会秩序的返祖现象,正如韦勒和他两人在他们分析1945年以前的德国社会所曾做过的那样。

对于卡罗·金斯堡(Carlo Ginzburg)和卡罗·波尼(Carlo Poni)这两位意大利微观历史学最重要的代表来说,宏观历史观念以及伴随着它们的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法之所以衰颓的关键原因,应该恰好是求之于对技术进步的有益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乐观主义的见解丧失了信心(见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1991)。反对宏观历史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论据则是根据政治的和伦理的理由甚至更有甚于根据方法论的理由,尽管……意大利学派特别要使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基本前提服从于探索性的方法论批判。对以现代化为其特征的世界历史过程之关键性的反驳,在他们看来乃是以人为其代价。……人民在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中,正如他们在把焦点置于在上的权势者身上的传统政治史学中是一样地被人忽视。历史学必须转而面向种种日常生活的情况,正如它们是被普通人民所经历的那样子。但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常生活的结构》一书中向他们所提供的那种日常生活史,却由于只关注物质条件但未能考察这些情况都是怎样被人经历的而未能触及要点。

我们已经指出了各种政治信仰不仅是在较老的政治史学派的学术研究中、而且也在晚近的社会史学的形式中(并且当然也在马克思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它们起着同样的作用,并且或许在新的日常生活的微观史研究中,起着更加显而易见的作用。意大利有许多历史学家,也像他们英国的许多同行一样,开始时自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却转而朝向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历史学的基本概念挑战——这一点并非偶然。对于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历史研究的主题已经从他们所称为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边缘”、转移到了多数人,而这些多数人在他们看来绝大部分都是并未得利的人和被剥削的人。这种对于未得利和剥削的强调,就把这种历史学和古老的有关大众生活史的浪漫传统……区别开来……

然而这些历史学家并不把多数人看做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看做是决不能消失在世界历史过程之

中、也不能消失在无名的群体之中的各个人。爱德华·汤普逊……宣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可怜的袜工……(和)默默无闻的手织工……从后世无比的轻蔑态度之下解救出来”。但是假如我们希望把无名的人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就得号召有一种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历史学研究途径,它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而且假如我们是在研究多数人的个人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认识论和这些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配套,它能让我们获得有关“具体”的而不是有关“抽象”的知识。

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有两个人的著作准备好了把文化定位为牢固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语境上的一种历史学,那就是乔治·杜比论婚姻、民族神话的延续和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大作(George Duby 1993, *The Knight, Lady and the Priest: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1980, *The Three Orders: Feudal Society Imagined*)和雅各·勒·高夫论知识分子与教士和工作的概念与类型的著作(Jacques Le Goff 1993, *Intellectuals in the Medieval Ages*)。勒·高夫和杜比也成功地写出过一部社会文化史,叙述以及个人占有着其中的中心地位,例如杜比论1274年7月27日星期日的布凡尼战役就是把一桩历史事件转化为一种民族神话(1973/1990, *The Legend of Bouvines*),以及最近雅各·勒·高夫1996年的圣路易传记一书。在整个20世纪的70年代在英语世界和意大利语世界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变得越发地常见了,例如Keith Thomas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16—17世纪欧洲民间信仰研究》(1971)、Peter Burke的《早期近代欧洲民间文化》(1978)、Natalie Z. Davis的《早期近代法国的社会与文化》(1975)和卡罗·金斯堡的《奶酪和蠕虫:一个16世纪磨坊工的宇宙》……

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然而在

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宣扬者们(他们在号召严格地概念的和分析的指导路线)和日常历史学的倡导者们(他们……热衷相信活的经验才应该是历史学的真正题材)双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Hans Medick在一篇关系重大的论文《划船里的传教士》(1984,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987, 76—98)中力图揭示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立场。就这种历史学而论,70年代和80年代以克利福德·盖尔茨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可以看做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模型。这一符号学的研究路数乃是盖尔茨的“重笔描述”这一概念所追求的,它意味着在和另一种描述的直接对抗。它也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预设的概念读给对方接受,而只是要如实地重新捕捉它。然而在这一点上,盖尔茨和梅狄克两人变得陷入了一场显然的矛盾之中,因为他们所号召的那种重笔描写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个人,而只是接触到他或她所陷于其中的那种文化。于是,那个“可怜的织袜工”——汤普逊是着手要把他的个人尊严从非个人的历史的势力之下解救出来的——又把自己的个性丧失给了文化,因为我们只能是通过塑造出他或她来的那种文化才窥见到个人。按照盖尔茨和梅狄克的想法,无论是人种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没有对别人经验的直接接触。因此他就只有通过象征性的和仪式上的行为不断在间接地猜测这些经验,这些行为是在个人的意图和行动的直接性之下进行,它们就构成一个文本使人可能接触到另一种文化。

柯斯卡批评了梅狄克的研究方法,说它是一种“新历史主义”(不可和前面讨论过的美国新历史主义混为一谈),根据的是两项理由:正如较老的历史主义一样,它断然摒弃了理论,而且在柯斯卡看来它坚持直接的经验就导致了方法论上的非理性主义。如果我们不从清楚明白的问题去观察——那会帮助我们在浩瀚无垠的经验中定位出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我们就无从具有某种对现实的一贯洞见。而在梅狄克看来,以精心概括出来的各种问题去研究我们的主题,这种做法本身就歪曲了我们的发现;但在柯斯卡看来,没有这些问题就使得有意义的知识成为了不可能。再者,在柯斯卡看来,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就会使得历史知识成为了不可能而且导致历史学的繁琐

化。因此就有一种危险,即日常生活史可能退化成为轶闻逸事和发思古之幽情。

可是梅狄克认为,“小的才是美丽的”一点都不不是指脱离了更大的语境之外的轶闻逸事史。事实上,梅狄克坚持说:历史学应该从对“中心”体制的关怀转移到边缘上面去,在那里可以发现并不符合既定规范的每个人。然而,个人却只能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为人理解。因此他所追求的微观史,缺少了一个宏观社会的语境便不能成立。不仅是梅狄克在德国所提出的 Alltagsgeschichte(日常生活史),而且也还有它那些意大利的宣扬者们……所构想的微观史,都设定有一种综合性的民间文化的存在。因此就有了朝着历史人类学的转向及其对文化象征表现的符号学研究途径。……

20 世纪的 80 年代,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原型工业化研究组的主要参加者汉斯·梅狄克和 Jürgen Schlumbohm,再加上当时也在这个研究所的一个美国人 David Sabeau……考察了一个特殊区域的进程……在某一层次上,这是老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继续。极其大量的数据被锁入了计算机,特别是有关结婚与死亡时的财产清单以及生命统计、审判记录、识字率,等等。结果便有了大量有关文化的信息。例如,财产清单就给出了书籍拥有量的信息。焦点便放在从旧制度到 19 世纪后期大约两百年这段时期内的某个村落或地方。尽管他们对盖尔茨频频表示敬意,但他们的研究路数却大为不同。他们是以当时他们所诠释的过硬材料和社会学数据、而不是以重笔濡染在进行工作的。把文化当做是一种整合的符号学体系那种盖尔茨式的概念……便被一种看出了分化与冲突的概念所取而代之。此外,在由前近代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的语境中,就出现了地方史。尽管这些历史学家们不喜欢现代化这个概念,他们却怀着对这些“代价”的警惕而在运用它。因此,他们就比自己所认可的更为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并更加远离了历史人类学。

在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德国人类学与微观历史学的史学家和意大利的微观历史学(microstoria)的实践者双方之间既有巨大的相似之点,又具有根本的分歧之点。尽管他们的政治观有相似之点,他们却是来自两种不同的传统。意大利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卡罗

·金斯堡、卡罗·波尼、乔凡尼·列维(Giovanni Levi)和爱多阿多·格伦狄(Edoardo Grendi)开始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增长概念所共有的那类宏观历史概念丧失了信心。他们希望再度赋给历史学以一种人间的面貌,这就导致他们不仅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反对分析的社会科学和年鉴派。年鉴派避免了前两者的狭隘性,但是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大厦,正如列维指出的,仍保留有很大空间可以容纳大量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研究路数,可是竟然没有人入住。

Microstoria 的实践者们,也像他们的德国同行们一样,想要回到具体的人的生活经验上来。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中的三种因素,其中有两种是他们与德国人所共有的: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各种经济力量……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没有它们历史便不可能为人理解,尽管不平等采取了各种远远超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之外的形式……三是他们的这一信念,即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他们在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路线的同时却避免了由盖尔茨所宣告的并被梅狄克在他有关传教士的论文中极为认真采用过的这一信念:即,历史学是从诗歌中获得它的许多洞见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立场也曾被海登·怀特所宣扬并被美国的文化史学家们(例如那塔利·戴维斯,1987,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所采用过,对于他们来说——至少是在他们方法论的论述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流动不居。对于 microstoria 的实践者来说,这条界线倒是并不很流动。他们坚持认为,历史学家所处理的乃是一项真实的题材。他们批评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路线,倒并非说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或是不该要的,而是说社会科学家作出了某些概括,而当用于检验他们号称要加以解说的那种小规模的生活的具体现实时,却是无效的。然而无论是在德国取向还是在意大利取向的著作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有某种矛盾。当意大利人对他们认为的盖尔茨方法论的非理性主义始终抱有怀疑的时候,他们(而尤其是金斯堡)却在自己的历史叙述中也在靠

拢盖尔茨那种重笔濡染的立场。相反地,德国人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工作,包括对漫长系列进行计算机分析。

和德国的微观历史学家们不同,意大利人在 *Quaderni Storici*(《历史学季刊》)杂志上拥有一个组织上的巩固根据地,它自从1966年创刊以来就在意大利占有一席颇有似于《年鉴》在法国和《过去与现在》在英国的地位,成为了视野广阔的各种历史研究的一个论坛。在德国,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历史与社会》)也起着这样一种作用,但却有着更强烈得多的社会科学取向。只是随着1993年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历史人类学》)的创立,才出现了一份代表微观历史学与历史人类学观点的德国杂志。

引人注目的是这份新杂志的第一卷刊登了卡罗·金斯堡一篇论意大利 *microstoria* 传统的文章。……宏观历史学的危机乃是20世纪70年代对那些宏伟的叙述之日益增长的幻灭感的一部分。立足于大量数量化的、计算机化的数据之上的大规模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质疑,倒并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不能应用的,而是因为大规模进行概括就从根本上歪曲了真正的现实。按微观历史学实践者们的说法, *microstoria* 的一项基本承诺就是要向“被其他方法所遗漏了的人们打开历史的大门”,并且要“在绝大部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

被 *microstoria* 的拥护者与福柯和盖尔茨的拥护者双方所宣扬的理论立场与方法论立场之间,既有亲和力和,但也有显著的差别。他们也像福柯一样,力图表明“霸权体制已经是怎样排斥了某些思维方式,认为是魔鬼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就像是金斯堡在他对磨坊哲学家和宇宙学家 *Menocchio* 的个案研究和列维在对乡村牧师 *Gioan Battista Chiesa* 的个案研究所做过的那样。他们也像盖尔茨一样,目的是要对文化进行一种“解释性”的研究,而那必须是“通过单独的、貌似无关重要的象征,而不是通过可重复的和可量化的观察所得出的规律”来着手进行的。用列维的话来说:“微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在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却一直坚持认为,在历史文本之外还有一个现实是可以为人知道

的。他们承认,其中掺入了知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微观历史学方法“就和把现实作为是客观存在的那些历史学家们所采用的传统陈述式的权威论述的形式分道扬镳了”。由于又回到了专业化历史编纂学以前的那种表现形式, *microstoria* 便引进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历史学家在其中不仅是传达了自己的发现,而且也传达了自己的操作程序。“在微观历史学中……研究者的观点就变成为叙事的一个内在部分”。叙述对于表现历史学家的发现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可以传达以抽象的形式所不能传达的各种成分,也因为表明了历史学家所由之以达到自己的叙述的那个过程。

然而尽管对客观性加上了这些限制, *microstoria* 却与更古老的社会科学共同享有几项基本的设定,使它有别于福柯的和盖尔茨的研究路数。Edward Muir 指出,就福柯而言“各种理论都是不能证实的,因为证实的标准是出自要使过去符合于现在的那种现代科学规范。正确性就是指与被一种规范或被一种体制所界定的事物秩序符合一致”。对金斯堡和列维而言,这是“一种逃避。正确性必须是由过去向我们提供的具体的、物理上的真凭实据来决定的”。*Microstoria* 并不全盘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但它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现有的现实来检验他们的建构理论。它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质疑盖尔茨对文化的研究路数。尽管盖尔茨声称他处理的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他却坚持把文化当做一个整体体系、当做一个整体的那种宏观社会概念。正如列维指出的:“我觉得微观历史学与解释性的人类学之间在观点上的主要分歧之一便是:后者在公共的符号与征象二者之间看出一种一致的意义,而微观历史学则力求参照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表现的多重性来界定它们和衡量它们”。那结果便是有一个由“社会分化”所标志的社会。在这里,有关霸权与社会不平等的各种考虑——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关注——就形成了微观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我们将简略地考察一下 *microstoria* 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即卡罗·金斯堡的《奶酪与蠕虫:一个16世纪磨工的宇宙》(1975)和乔凡尼·列维的《继承的权力:一个魔法师的故事》(1985)。……金斯堡的书已经成为一部经典著作,或许也因为它读起来是那么



好,而且呈现给了我们一个异常之丰满的个人。列维笔下的魔法师则更其深入得多地被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而且那文本也更其分析的。两部书都有着 *microstoria* 的一般特征,即专注于一个给定地点的某个人,并且力图强调该地方背景与更大范围的不同之点。两部书都精心重建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焦点又都是放在地域性的而非更广阔的跨地区的层次上。然而金斯堡对他的主角梅诺奇奥的研究途径要比列维的更加是解释学的。主要的焦点放在了梅诺奇奥的心灵世界上。而进入他心灵的那条途径则是通过他所阅读的文本。阅读并不是一种可以借之传达意义的非个人的过程,倒不如说那是精英心灵的著作通过了大众文化的三棱镜而射入这位农民磨坊主的心灵之中。而金斯堡本人的想象力对于重建梅诺奇奥的思想历程也是要害所在。书中的叙述是受到了作者所提出调查策略的干扰的。列维的关注则更加是在社会科学上,它要检验或纠正已有的各种假说。它往往用许多段话来说出所要肯定的假说。其中中心的关注则是乡村中权力关系的模式。用经济因素或政治制度的术语是理解不了这些的。列维质疑的是,市场非个人的各种力量和近代国家机器的发展就决定了这些权力关系到一个什么限度。他论证说,要理解农民世界,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对难以捉摸的象征性的财富(即权力和威望)的保持和接受”。为了确立他的论点,他就诉之于更为传统的社会史所运用的各种资料和方法,即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他也叙述了从土地买卖的数据到家庭组织和继承的数据,从而证明了在乡村中运作着的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盲目的市场、而是一个复合的市场,其中社会的与个人的关系(包括家庭的策略)对确定价格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没有矛盾的、高度凝聚的农民社会之牧歌式的形象,就在这种分析的过程之中瓦解了。

……

微观历史学家的理论叙述和他们的实际研究及写作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他们正当地强调了历史中的不连续性,并由此推论出来:任何宏伟的叙述都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是以一种大抵上对现代化是负面的评价在进行操作的。尽管他们发现他们所研究

的近代社区中也有种种冲突和分裂,然而他们却是怀着一定程度的恋旧之情在观察它们的消逝的。那就是说,他们之转向微观史的社区,并非仅只是因为材料可以对它们从微观史角度进行研究,而且也因为他们对近代世界抱有某种厌恶之情。有许多年鉴派的历史学家很可能是受到同样驱使而转向中世纪或早期近代世界的。在近来许多人类学定向的著作中——例如 Eric Wolf 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各民族》(1982)与 Sidney Mintz 的《甜蜜和权力:近代史上的糖》(1985)——被看做是一种破坏力量的现代化,就构成为研究欧洲对非西方世界扩张中的一条红线。这也往往就是中世纪研究的情况,例如前面提到的雅各·勒·高夫有关近代的时间概念的起源《中世纪的时间、工作与文化》的那篇名文。尽管福柯强调历史并没有统一性而是被“断裂”所标志着的,然而他有关精神病、诊疗所和监狱的那些著作却又设定近代史的历程是以日常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规范为其特征的。……而这也是诺伯特·埃利阿斯那部实质上是一部宏观史的《文明史进程》一书的主题……

有几种批评曾经反复被提出来,用以反对微观历史学家们:(1) 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小规模历史的专注,就把历史学归结为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2) 他们把以往的文化浪漫化了。(3)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因为他们着意要研究相对稳定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能研究以迅速变化为其标志的近代和当代世界。(4) 就此而言,他们便没有能力研究政治。

然而,也曾作出过认真的努力,要用微观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 20 世纪的政治冲突。把近代与现代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 参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和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微观史联系起来的,则是要致力于走出非个人的社会结构与过程之外而钻入到具体的人生经验之中。……微观历史学再一次被看做并不是对大规模社会与政治过程分析的代替品,而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微观历史学的调研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被传统史料所忽略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传记和回忆对于重构他们的生活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显然,在大多情况中这些资料是无法利用的。又是在这里,口述历史便可以作出贡献。口述历史曾特别用之于研究



受害者,而近来也还有“holocaust”的罪魁祸首,但最近则是斯大林式的迫害与屠杀的受害者和罪魁祸首。无可讳言,访问也有问题,特别是这些搜集都是在几十年之后,这时被访问人的记忆已经受到后来事件与经验的影响。然而访问可以由其他的证据或其他的访问加以核对来证实。地方史研究小组往往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表达普通平民的生活经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类方法特别是在德国、而近年则是在苏联,已经被用来作为最近历史重构工作的一部分。

.....

这就再一次把我们导向微观历史学的实践者们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他们反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关键论据便是:这样的历史学就剥夺了已往历史的质的那方面,而没有给它留下一幅人间的面貌。问题是怎样才能够重行捕捉历史中的人间的和个人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汉斯·梅狄克在克利福德·盖尔茨的文化人类学的“重笔濡染的描述”中就发现有这样一种历史的典型。历史学也像人类学一样,乃是一种解释性的而非一种系统性的科学。冷静的分析是被一种难以言传的顿悟所取而代之。然而在我看来,这种重笔濡染的描叙式的知识论包含有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它把它的研究题材看做与观察者全然不同。它正确地警告说,不要把观察者的思想

范畴投射到被观察者的身上。重笔濡染的描述,应该使得“另一个人”以他的或她的“另一个人的性质”呈现于观察者之前。这就赋予了观察者的主体的一种“客观性”的成分,并使之呈现为一个被嵌入现实之中的客体。而另一方面,这种人类学的研究路数也就是在向世界的客观性挑战。它把别人看做是需要加以阅读的文本,非常之像是阅读一篇文学的文本那样。然而,一个文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阅读。这种研究路数的逻辑后果,将会是取消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但事实上,这并非微观历史学家的本意。在他们努力要复原他们所研究的男男女女们的主体性与个体性的时候,他们摒弃了种种充满说不清的社会科学构造和过程的成见,但是他们作为历史学家也在他们的工作中认定是在面对着一种真实的题材的。在他们努力接近这一题材时,他们非常愿意使用社会科学的各种工具。……尽管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意大利人比他们德国的同行们格外着重于思考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且更少依靠计算机,然而他们却拒绝他们认为是盖尔茨方式的那种文化人类学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归根到底,微观历史学看来并不是在否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语境)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历史学家们就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

